

中国城镇发展中的就业问题*

丁守海

摘要：乡镇层面的城镇化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不同，它除了从需求角度影响存量劳动力的就业外，还会从多个维度冲击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并改变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的调查发现，城镇化普遍提高了各类劳动力的非农供给意愿，但并没有绝对改善非农产业的劳动需求，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就业后果。依托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来推动城镇发展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推进，非自愿型失业明显减少；在那些脱离周边城市的协同效应而孤立推动城镇化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滞后，非自愿型失业现象反而加剧。因此，在乡镇层面推动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产业融合的问题，这有待于对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更系统的整体设计。

关键词：城镇化 工业化 失业风险 产业融合

作者丁守海，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系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外来语“Urban”作为形容词，其所指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城市（city），也包括规模更小的城镇（town）。城市化既可能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可能表现为乡镇层面的城镇人口扩张与规模膨胀。^①既有研究表明，改革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促进就业特别是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般都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对于乡镇层面的城镇化会对就业带来怎样影响的问题，人们还很少进行研究，当然也没有形成共识性的结论。鉴于就业问题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在新一轮城镇化背景下澄清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本文将致力于探讨乡镇层面城镇化的就业影响。我们认为，这一分析范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城市化只是在城市范围内通过非农产业的

* 本文为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城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城市化内涵的辨析，参见简新华、黄锜：《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发展，满足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由于中心城市或大中城市的集聚效应明显，其就业带动功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由于受市场信号的调节（如托达罗模型中就业概率的调节），劳动力流入数量乃至劳动力供给总量基本能维持均衡的格局。但在乡镇城镇化过程中，集聚效应和供求均衡这两个因素都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将受到巨大冲击，不仅失地农户亟待就业务工，非失地农户的意愿也因种种因素的作用而有所提高。这些新增的边际劳动力多为过去农村留守劳动力的主力，要么年龄偏大，要么属于家庭生产型（如妇女），离乡的意愿不高，吸纳这部分人口主要靠本地非农部门的发展，如果城镇化不能促进非农产业发展，这些劳动力的非自愿型失业将会增加。那么，城镇化到底能不能反推非农部门的发展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答案。因为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乡镇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后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它取决于城镇化的推进方式，在不恰当的方式下就可能酝酿失业风险。

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调查数据，我们检验了上述逻辑推理。研究发现，乡镇城镇化普遍提高了各类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但与此同时，城镇化并没有绝对地反推非农产业的发展，或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出现了不同的就业后果。在那些依托中心城市辐射效应而推进城镇扩张的地区，非农部门呈同步发展的势头，非自愿型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那些远离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而单独推进城镇化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滞后，非自愿型失业率明显上升。

上述结论提醒我们，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乡镇城镇化将面临更迫切的产业支撑问题，只有实现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反推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这需要对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更系统的设计，并妥善处理城镇与城市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避免盲目冒进地推动城镇化。

二、文献综述

可能是由于西方国家较早地实现了城市化的缘故，西方学者研究城市化过程的文献并不是很多，而且大都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为研究对象，样本也集中在较早时期或发展中国家。它们零星地讨论了城市化的就业效应问题。

这些文献的讨论维度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城市化对劳动力分布结构特别是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的影响，^{①②} 城市化对劳动力供给、就业吸纳乃至非

① H. Moir,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bor Force Structure,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26, no.1, 1997, pp.25-41.

② J. Gibbs and W. Martin, "Urbaniz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ternational

正规部门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①②} 在一篇以中国为样本的文献中,人们还讨论了城市规模结构的影响,并证明了城市规模对农民迁移决策的正向作用。^③ 从一些早期文献开始,人们就注意到城市化的就业影响与工业发展问题密切相关。^④ 二是在微观层面,人们讨论了城市化对劳动者个体求职行为或雇主行为的影响,如城市化对年轻人职业流动性的影响、^⑤ 对雇主提供的就业岗位类型的影响。^⑥

由于缺少对乡镇层面城镇化的考察,特别是对中国背景下乡镇城镇化的考察,这些文献很难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直接的参考。这个问题在国内研究文献中也同样存在。国内学者对城市(镇)化就业问题的考察大致分成以下两个分支。

一是直接考察了城市化的就业影响。从结论上看,他们大多是持肯定态度的,即城市化是促进就业、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⑦ 如果忽视城市化建设,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并对就业造成巨大的冲击。^⑧ 这些研究文献与西方研究范式类似,都是以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为研究对象,既可能包括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也可能包括以乡镇为基础的城市化,它们即便能证明城市化带动了就业,也未必能说明乡镇城镇化也是如此。

至少可以说,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乡镇城镇化的就业效应并不是那么容易识别。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人们对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折射出来。改革以来,人们就中国究竟应选择以大中型城市为主导,还是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⑨ 尽管在早些时候,随着乡镇企业崛起,一些学者强调小

① Patter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7, no.5, 1962, pp. 667-677.

① Thomas Oberson Wilkinson, *The Urbanization of Japanese Labor, 1868-1955*,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56.

② S. Sethuraman, "Urbanisation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Djakarta,"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112, no. 2, 1975, pp. 191-205.

③ Chun-Chung Au and J. Vernon Henderson,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3, no.3, 2006, pp.549-576.

④ W. Moor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Labor Attitudes toward Industrial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5, no.2, 1955, pp.156-165.

⑤ M. Finney and J. Kohlhase,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Labor Turnover,"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48, no.2, 2008, pp.311-328.

⑥ L. Shilton and J. Webb, "Headquarters, Office Employment, and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York City Region,"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10, no.2, 1995, pp.145-159.

⑦ 杨宜勇:《城市化创造就业机会与城市就业空间分析》,《管理世界》2000年第2期。

⑧ 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⑨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城镇模式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①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小城镇模式的不足,并开始重视大中城市发展的必要性,以发挥其辐射带动的作用。^②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也反映到政策调整上,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对城市化规模结构的定位,从片面强调小城镇优先发展,转向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对既有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人们也进行了反思,强调要对其进行功能改造与升级,^③以顺应农村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中国版城市化逻辑次序。^④

上述转变反映了人们对小城镇经济功能的担心,至少,它不如城市那么明显,后者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及经济效率已得到诸多研究的证明。^{⑤⑥}但对小城镇来说,人们还很少能明确地证明其经济效率就一定是高的或低的,人们也很少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为此提供判断证据。更重要地,在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下,行政机制经常取代市场机制,成为重要的资源配置力量,它是否会违背客观规律并损害城镇化的内在效率,也是值得关注的。^⑦就业是引致性需求,小城镇经济效率的不确定性必然延伸到就业领域,我们有理由对其就业效应持谨慎态度。

另一些学者则直接考察了乡镇层面城镇化的影响,它们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价值有限,因为它们有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在考察维度上,只侧重从劳动供给角度分析城镇化影响,如城镇化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迁移决策、^⑧失地农民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等,^⑨而忽视了对劳动需求变化的考察。我们知道,就业是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考察城镇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不考察它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就难以洞察城镇化对就业影响的全貌。第二个缺陷则源于考察对象的狭隘性。有些文献虽然直接考察了城镇化的就业影响,但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失地农民或失地农民中的某一特定群体,如妇女,^⑩这就限制了研究的视野。

① 叶克林:《论以小城镇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管理世界》1986年第5期。

② 高珮义:《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③ 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2期。

④ 秦兴方等:《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推进次序——江苏的实践及其启示》,《管理世界》2002年第3期。

⑤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⑥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⑦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⑧ 卫龙宝等:《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对浙江省海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⑨ 成得礼:《城乡结合部地区失地农民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成都与南宁的证据》,《改革》2008年第9期。

⑩ 孙良媛、李琴、林相森:《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村妇女就业及其影响因素——以广东省

不可否认，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空间扩张，它必然涉及征地的的问题，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理应成为城镇化就业效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城镇化只会影响失地农民的就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城镇化是个系统工程，通常会与其他的政策举措相配套，产生出很多间接影响因素。例如，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地方的城镇化是与新农村建设并行推进的，集中居住后的农户往往离农田更远，耕作变得更不便利，这会引导他们放弃农业生产，转向非农领域谋生，就业状况也会随之改变。再如，过去很多留守劳动力之所以困守农村而不能转移，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分工的制约，^① 城镇化可能会改变这一状况。随着城镇的发展，饭店、幼儿园、养老机构等也会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将留守劳动力从繁重的家庭生产任务中解放出来，劳动供给与就业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未系统地阐释乡镇城镇化的就业效应问题，它们要么定位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要么不能综合权衡供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抑或只局限于狭隘的考察对象，而不能通览全体。对于中国城镇化的就业影响问题，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展开更系统的专门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辨析，更要利用有代表性的调研数据，通过实证考察，揭示问题的真实面貌。

三、理论辨析与研究假说

首先来看城镇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我们知道，劳动供给决策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体理性，在相当程度上，它取决于家庭理性，^② 因此，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析。令农户的时间禀赋可以配置于四个领域：务工、农业生产、家庭生产、闲暇。除务工时间外，其余三个领域的时间通常都有很大的重合性。留守农村的时间往往既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也用于家务劳动或闲暇，很难严格区分，同时也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的是非农劳动供给问题，我们只对时间禀赋 T 做二分处理，即非农部门的务工时间 L 和留守农村的时间 h 。

时间配置原则是家庭效用 U 的最大化，家庭效用主要取决于总收入 I 和家庭生产活动的产出 G ：前者决定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后者对生活质量也有很大的影响。至于闲暇，它与家庭生产活动相互交融，如陪伴孩子的过程既可以视作家庭生产，也可以视作享受闲暇，因此不再单独列出。令工业工资为 W ，农业生产的单位收益为 A （它也可以视作务工的机会成本），那么，当配置 L 于务工时，工资收入为

^① 为基础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 年第 1 期。

^① 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

^② G. Becker,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no. 299, 1965, pp. 493-517.

WL。进一步，令消耗于务工地点与家庭之间的往返时间为 R，那么留守时间为： $h = T - L - R$ ，对应的农业生产收益为： $(T - L - R) A$ ，与工资收入合并后可得到家庭总收入： $I = (T - R) A + (W - A) L$ 。家庭生产活动的产出也同样取决于留守时间 h，令生产函数为： $G = g(h)$ 。基于上述条件，可构建家庭的时间配置模型：

$$\begin{aligned} \max \quad & U(I, G) \\ \text{s.t.} \quad & I = (T - R) A + (W - A) L \\ & G = g(T - R - L) \\ & 0 \leq L \leq T - R \end{aligned}$$

令拉格朗日因子为 λ ，可构建如下的拉格朗日方程：

$$Z = U((T - R) A + (W - A) L, g(T - R - L)) + \lambda (T - R - L) \quad (1)$$

根据变量 L 的边际条件、非负约束以及互补松弛条件，可得：

$$\frac{\partial Z}{\partial L} = U'_1 W - U'_G g' - \lambda \leq 0; L \geq 0; L \frac{\partial Z}{\partial L} = 0 \quad (2)$$

再根据 λ 的边际条件、非负约束以及互补松弛条件，得到：

$$\frac{\partial Z}{\partial \lambda} = T - R - L \geq 0; \lambda \geq 0; \lambda \frac{\partial Z}{\partial \lambda} = 0 \quad (3)$$

任何家庭都必须配置一定时间于家庭生产活动，因此有： $h = T - R - L > 0$ ，对应于 (3) 式， $\frac{\partial Z}{\partial \lambda} > 0$ ，从其互补松弛条件可得： $\lambda = 0$ ，代回 (1) 式，则拉格朗日方程退化为原目标函数，(2) 式的边际条件也退化为普通的极值条件：

$$\frac{\partial U}{\partial L} = U'_1 W - U'_G g' = 0 \quad (4)$$

考虑到边际替代率为： $MRS_{G,I} = \frac{-U'_G}{U'_1}$ ，边际转换率为： $MRT_{G,I} = \frac{-p_G}{p_I} = \frac{-W}{g'}$ ，其中， p_I 、 p_G 分别代表收入和家务劳动价格，即家庭生产的边际产出 g' 及工资 W。于是：

$$MRS_{G,I} = MRT_{G,I} \quad (5)$$

上述原理可用图 1 表示。图中第三象限为时间预算线，它满足 $L + h = T - R$ ；第二象限为收入线，它满足 $I = (T - R) A + (W - A) L$ ；第四象限为家庭生产函数，它满足 $G = g(h)$ 。假设对应于时间预算线上的 Q_0 点，家庭配置时间 L_0 于务工，并配置 h_0 于留守农村，那么，从第二象限可以看出，此时的总收入为 I，家庭生产活动的产出为 G，二者在第一象限交汇到 A 点。依此类推，可得若干个组合点，它们构成家庭生产可能性边界 S。进一步，令无差异曲线如 U 所示，它与 S 相切于 E 点，这时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相等，即满足 (5) 式。这就是家庭选择的均衡点，

收入与家务劳动的产出分别为 I^* 和 G^* ，务工和留守的时间分别为 L^* 和 h^* 。

下面我们来看城镇化会通过哪些渠道影响非农劳动供给。

第一，城镇空间的扩大。如果是在本地务工，那么用于务工地点与家庭之间的时间将缩短，务工将变得更为便捷。在图 1 中，从 R 减少为 R' ，时间分配预算线将从 $T-R$ 外移至 $T-R'$ ，家庭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如从 S 移动至 S' ，它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也会外移，如从 E 点移动至 E' ，务工时间 L 由此增加。

第二，城镇社会服务功能的完善。这将提高家庭生产活动的效率，如幼儿园、餐饮服务、养老机构等的兴建，可使家庭妇女在付出较少时间的情况下，完成同样的家庭生产任务。在图 1 中，这相当于家庭生产函数向外移，如从 $g(h)$ 移动至 $g'(h)$ ，与上述情形一样，这时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务工时间也相应增加。

第三，征地。其影响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因为耕地减少，单位农业生产的收益将下降，如从 A 降为 A' ，它使第二象限的收入预算线变得更陡。其次是征地补偿款，如 M ，总体上应该使收入预算线的截距上移，并达到 $I' = (T-R)A' + (W-A')L + M$ 的位置。经过类似的推导，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应该外移，如移至 S'' ，均衡点也会外移到 E'' 。但由于收入预算线 I' 上移， E'' 点对应的务工时间 L 不一定增加，也可能减少，其原因就在于征地补偿款使预算约束软化了。最终结果取决于家庭偏好：如果家庭更偏好于收入，那么 $MRS_{G,I}$ 较小，无差异曲线更平缓， E'' 点的位置更高，务工时间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家庭更偏好于闲暇或家庭生产，务工时间就会减少。

第四，其他渠道。如前面提到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行推进，集中居住后的农户离农田更远，使耕作更为不便，这等同于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单位农业生产的净收益下降。与征地的第一个影响一样，它将增加非农劳动供给意愿。

城镇化的最终影响要看上述几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如果将农户分为征地型和未征地型两种，那么对后者来说，就没有征地影响，而余下几种效应均为正，因此劳动供给必然增加。对于被征地农户，如果家庭更偏好收入，那么，四种效应也为正，劳动供给必然增加；如果更偏好闲暇或家庭生产，则收入效应为负，而其余三种效应为正，劳动供给的最终变化取决于对它们的比较。除非家庭极度偏好闲暇或家庭生产，否则收入效应难以抵消其他三种效应，劳动供给仍应呈增加态势。我们认为，在农村传统习俗特别是劳动观念的影响下，即便预算约束软化，也很少会出现放弃劳动的情形，收入效应吞噬其余三种效应应属罕见，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城镇化会使各类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增加。

由于农村精壮劳动力多已外出务工，城镇化释放的边际劳动力多为留守人员，他们要么年龄偏大，要么是家庭生产型（如妇女）。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离乡意愿并不高，要消化这部分新增劳动力，主要靠发展当地的非农产业来进行。那么，城镇化是否一定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并扩大劳动需求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像考察劳动供给那样，构建一个系统的框架进行分析，但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以及对经验事实的考察，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结论的。从文献梳理的角度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既有研究并不能确定城镇化的经济效率及产业发展后果，它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经验事实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找到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正面的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非常注重与工业化的协同。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群的人口快速膨胀，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集聚了全国总人口的 40% 以上，^① 与此同时，这些城市也快速发展为日本最重要的工业带。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促，工业发展为新增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所以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大的失业问题。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出现城市化不能带动产业发展及劳动需求扩张的非良性循环。如巴西 1980 年城市化率已达到 52%，但工业部门只能提供 20% 的就业岗位，“城市病”由此而生。^②

既然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存在正反两种可能，而城镇化特别是行政机制主导的城镇化的经济绩效，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此推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它未必能扩大非农劳动需求。

综合假设 1 和 2，一方面，城镇化使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增加，但另一方面，又未必能扩大非农劳动需求，非自愿型失业就可能会上升，故有第三个假设。

假设 3：在不当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下，农村劳动力的非自愿型失业可能会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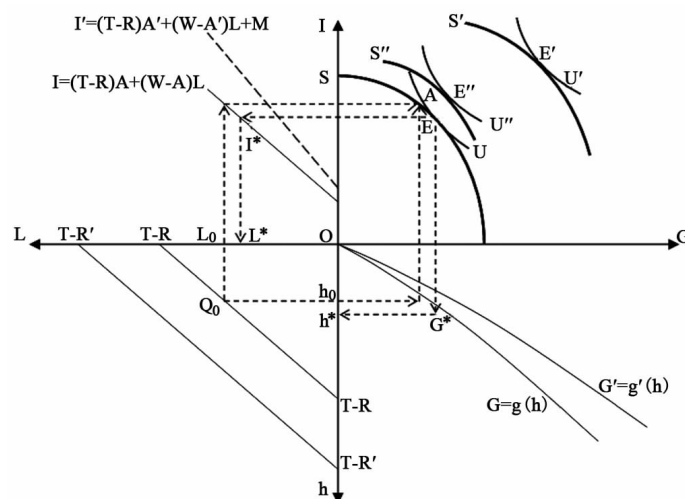


图 1 城镇化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分析

① 参见 The Statistics Bureau of Prime Minister's Office,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Tokyo: Jap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82.

② 参见高波：《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62—63 页。

四、实证研究方法与数据的统计性说明

我们将基于河南、湖南、山东、四川、甘肃等五省的调查数据展开分析。它们分布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为剩余劳动力集中的农业大省，有较强的代表性。调研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轮调查于 2010 年 7 月至 8 月进行。先从每个省抽取 2 个县，然后从这些县抽取 50 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抽取 30 个农户，这样，共有 1500 个农户样本。调查获取的是 2009 年的信息。第二轮调查于 2012 年 7 月至 8 月进行。样本与上一轮相同，属于追踪调查。在第二轮调查中，共有 149 个农户样本因全家外出、搬迁等原因而缺失，因此实际样本数减少为 1351 户。此轮调查获取的是 2011 年的相关信息。第三轮调查则于 2013 年 6 月至 8 月进行，主要通过电话进行回访，并就乡镇层面的一些信息做补充调查。在此轮调查中，有效样本数为 1209 户，反映的是 2012 年的情况。

（一）实证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我们构建如下三类检验模型。

模型 1：检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

利用这三轮调查，我们构建如下基于面板数据的离散选择模型：

$$p(y_{it}=1) = \frac{e^{y_{it}^*}}{e^{y_{it}^*} + 1}$$

$$s.t. \quad y_{it}^* = \beta_0 + (\beta_1 + \varphi IND_{it} + \gamma LOS_{ij}) URBAN_{it} + \sum \gamma Z_{it} + e_{it}$$

其中，下标 i 代表各受访者； t 代表 2009 年、2011 年和 2012 年。

被解释变量 y 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在问卷中凡回答“在过去一年里想到非农部门找一份工作”，但又“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的”的，视为非自愿失业， y 取 1；没有这样经历的（包括已在非农部门工作的和自愿失业的），则 y 取 0。

解释变量包括在潜函数 y^* 中。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 $URBAN$ ，即城镇化率。我们在核算这一指标时，除包括本乡镇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数外，还包括在本乡镇生活但没有本地非农户口的外来常驻人员（年居住时间半年以上）。

为了考察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的情形，并比较不同情形下城镇化的就业影响，我们专门设置哑元变量 IND 。具体地，我们用各乡镇非农产业在总增加值中的比重，表示工业化程度，然后用它除以城镇化率得出一个系数，反映工业化相对于城镇化的水平，再对各乡镇计算该系数的平均值。对于那些系数小于该平均值的乡镇来说，代表城镇化受工业化支撑的程度相对较小， IND 取 0，并作为基准组；相反，如果大于平均值，代表城镇化受工业化支撑的程度相对较大， IND 取 1，作为比较组。比较组和基准组城镇化对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差异，反映在系数 φ 上。

类似地，为比较城镇化对被征地农户和非征地农户的就业影响，我们再设置哑元变量 LOS。对于未征地农户，LOS 取 0，作为基准组；对于被征地农户，LOS 取 1，作为比较组。城镇化对两组样本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差异反映在 γ 上。

Z 为控制变量，即可能对非自愿型失业造成影响的其他一些因素。非自愿失业作为一种就业后果取决于供求两个方面因素，其中，供给因素包括以下七项。（1）家庭抚养比 RAISE。研究表明，家庭人口结构会对劳动供给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抚养比越高，家庭经济压力越大，劳动供给压力也越大，但家务劳动负担也会越重，并制约劳动供给特别是妇女的劳动供给，所以影响是多重的。^① 我们用 16 岁以下孩子与 60 岁以上老人占家庭人数的比重表示抚养比。（2）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的对数 LAND。它越大，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多，越会制约非农劳动供给。（3）农业收益的对数 AGRI。按刘易斯模型的预测，^② 务农收益作为机会成本，会对工业劳动供给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用家庭农业生产的净收益，除以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劳动力人数，得到劳均务农收益。（4）工业工资的对数 WAGE。它与农业收益结合起来，可以反映务工的比较收益，进而会对农村劳动力务工决策产生影响。实际上，作为成本，它也会影响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因此也可以作为一个需求因素来看待。对于未务工的受访者，用当地小工工资来代替工资。（5）家庭财富的对数 WEAL。它会影响到家庭预算约束的松紧程度，进而影响到劳动供给决策，我们用家庭资产总价值来表示。（6）家务劳动的替代手段 APPL，如家用电器的使用，能减轻家务劳动负担，并刺激劳动供给。我们用农户是否有洗衣机作为其替代指标。（7）农村生活的社会化服务网络 CARE。我们以附近是否建有幼儿园来代表。

至于非农劳动需求，最好是用非农产业增加值来表示，但这样可能会与城镇化指标发生相关性，并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用如下指标来替代。即在本乡镇外务工的人数与本乡镇劳动力总数之比 OUT。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涉及成本收益的核算，距离越远，交通成本等费用就会越大。显然，如果本地就业机会多，人们更愿意就近务工而不是外出，外出务工的比例应该更小。因此它既能反映本地对非农劳动的需求，与城镇化指标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联。

还有一些人力资本方面的变量，会同时影响劳动供给和需求，主要有以下几项。（1）年龄 AGE。（2）婚姻状况 MARR：已经结婚的，取 1；尚未结婚的，取 0。（3）是否担任过村队干部 LEAD：担任过干部的，取 1；未担任干部的，取 0。它反映了受访者的社会能力。（4）教育年限 EDU。（5）是否拥有技术等级证书 SKILL。（6）曾经外出务工的年数 EXPER，这可以视作工作经验。上述指标会对企业是否

① I. Garcia and J. Molina, "Household Labour Supply with Rationing in Spain," *Applied Economics*, vol. 30, 1998, pp. 1557-1570.

② 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22, 1954, pp. 1-32.

录用受访者产生影响,如一些企业更愿意招青年未婚工人,而不招大龄或已婚劳动力;同时,这些指标也会对受访者自身的非农供给意愿产生影响,如对于年纪较大的受访者来说,通常更愿意做点家务或农活,而不是出去打工。

模型 2: 检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意愿的影响。

与模型 1 一样,被解释变量 y 也是二元离散选择变量,凡回答“在过去一年里想到非农部门找一份工作”的受访者,视为具有非农劳动供给的意愿, y 取 1; 否则, y 取 0。核心解释变量也包括 URBAN、IND×URBAN、LOS×URBAN。控制变量 Z 为影响非农劳动供给意愿的其他一些因素。它们与模型 1 的区别在于,去掉了乡镇层面的劳动需求变量 OUT,其余 13 个控制变量则均予以保留。

模型 3: 检验城镇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

人们希望通过城镇化,促进非农部门发展并扩大劳动需求,以解决城镇化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我们将设置如下模型来检验这一情况:^①

$$G_{it} = \alpha_0 + (\alpha_1 + \delta \text{NEAR}_{it}) \text{URBAN}_{it} + \sum \xi V_{it} + u_i + \lambda_t + \epsilon_{it}$$

其中,下标 i 代表各乡镇; t 代表 2009 年、2011 年和 2012 年。

在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G 为反映各地非农产业发展状况的指标。具体地,我们参照常用的度量工业化程度的指标方法,用非农产业在当地 GDP 中所占比重来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城镇化率 URBAN,它与模型 1 的计算方法相同。

城镇的区位不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影响可能不同。那些紧邻县城或中心城市的乡镇,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辐射机会,城镇扩张也通常能更好地带动非农产业发展,偏远乡镇则机会较少。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设置哑元变量 NEAR: 如果该乡镇为县城城关镇或毗邻某一中心城市,NEAR 取 1; 否则取 0。再设置 NEAR 与 URBAN 的交叉变量,城镇化对两组样本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差异,反映在系数 δ 上。

V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 LABOR。很多工业项目迁入内地的原因是获得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如富士康内迁。从这个角度讲,农村劳动力的丰裕程度会对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二是当地的矿产资源 RESOU。区位优势、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优势,通常是各乡镇发展非农产业的重要支撑点。如果该乡镇发现矿产资源,RESOU 取 1; 否则取 0。^②

u_i 和 λ_t 分别为截面效应和时间效应,所以,上述模型为双效应模型,引入它们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住遗漏变量带来的干扰。

① 模型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非农产值比重会对城镇化造成反作用。但正如李强等所指出的,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来主导推进的,因此城镇化有很强的外生性,在相当程度上,它取决于政府意图而非工业化的内在推动,如各地的造城运动。从这个角度讲,非农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内生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强。(参见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

② 鉴于乡镇样本数量不多,为了不过度消耗模型自由度,我们未引入过多的控制变量。

(二)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以乡镇为单位，计算几个核心变量的统计指标。以非自愿型失业率为例，先以各乡镇为单位，计算被调查劳动力中有过非自愿型失业经历的样本所占的比率，再对所有乡镇计算相关的统计性指标。其余指标依此类推。

表 1 核心变量的统计性指标

单位：%

变 量	年 份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镇化率	2009	9.55	33.03	4.10	72.08
	2011	11.61	36.23	4.65	74.25
	2012	12.98	38.74	5.33	75.43
工业化率	2009	35.26	30.28	13.28	83.69
	2011	39.43	39.05	15.17	85.05
	2012	41.85	28.83	17.40	88.71
非自愿型失业率	2009	25.26	19.73	12.64	37.92
	2011	20.07	26.81	10.75	34.73
	2012	22.38	30.10	11.86	35.18
非农部门意愿型 劳动供给比率	2009	59.22	45.75	46.30	73.15
	2011	66.03	39.28	50.83	77.26
	2012	69.34	51.60	52.57	80.60

表 1 显示，2009 年各乡镇的平均城镇化率为 9.55%，2011 年升至 11.61%，年平均增加 1.03%，2012 年达到 12.98%，比上年增长 1.37%。不同乡镇的城镇化率存在很大差异。一些乡镇因为本身就是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化率非常高，城镇化率甚至超过 70%，而其他一些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比重还不足 10%。至于工业化率，2009 年平均为 35.26%，即超过 1/3 的增加值来自于非农业部门；到 2011 年，平均工业化率上升到 39.43%，年均增加 2.09%；2012 年则超过了 40%。再来看几个核心的就业指标。2009 年，平均的非自愿型失业率为 25.26%，即在过去一年里有近 1/4 的受访者，经历过非自愿型失业；2011 年，该比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降至 20.07%；但 2012 年又回升至 22.38%。关于非农部门意愿型劳动供给比率，2009 年平均为 59.22%，即有近 60% 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愿意并试图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2011 年该比例上升至 66.03%；2012 年则进一步增加到 69.34%。

五、城镇化对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

我们运用面板 logit 模型，估计模型 1。首先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来估计，然后根据 Hausman 值判断，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Hausman 值为 0.29，即使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能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为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另一个需处理的问题是对结果的解释，这也是 logit 模型最困难之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我们直接报告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而不再计算它们对响应概率的边际效应。当然，从各系数的正负情况已经可以判断出各变量对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方向。（见表 2）

表 2 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Z 值
常数项	2.328	3.067	0.759
RAISE	-0.099***	0.026	-3.808
LAND	0.086	0.063	1.360
AGRI	-0.005	0.004	-1.328
WAGE	-0.161**	0.058	-2.779
WEAL	-0.282***	0.069	-4.063
APPL	1.012	0.917	1.104
CARE	0.003**	0.001	2.884
OUT	0.353**	0.126	2.807
AGE	0.019*	0.009	2.095
MARR	0.263	0.415	0.633
LEAD	0.038	0.031	1.207
EDU	2.571	3.185	0.807
SKILL	-0.539***	0.125	-4.320
EXPER	-0.096***	0.024	-3.962
URBAN	0.065**	0.023	2.855
IND×URBAN	-0.122***	0.025	-4.893
LOS×URBAN	0.031***	0.009	3.590
对数似然比	-127.63		
Wald 统计量	95.38		
样本数	3558		

注：***、**、* 分别代表通过 1%、5%、10% 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 2 可以看出，RAISE 的系数为 -0.099，这表明当家庭人口负担系数增加时，农村劳动力的非自愿型失业概率会减少。如前所述，随着家庭人口负担系数的

增加,需照顾的孩子或老人数量增多,家务劳动负担也会随之加重,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相应地,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也会减少。LAND、AGRI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及务农收益指标对非自愿型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务农与务工收入差距悬殊,达到数倍甚至十数倍,远远超过刘易斯当年预测的30%或50%,因此,务农收益的微小变动可能很难对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产生很大影响,相应地,也不会对非自愿型失业造成显著的影响。WAGE的系数显著为负,为-0.161,说明随着工业部门工资的提高,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会下降。WEAL的系数为-0.282,说明随着家庭财富基础的增加,非自愿型失业概率也会降低。CARE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03,说明随着社区生活服务网络的完善,出现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会增加,当然,影响程度比较小。这可能与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有关。OUT的系数为0.353,说明随着外出务工比例的增加,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上升。因为外出务工比例与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呈反比,它越大,说明本地务工的机会越少,对于那些只愿在本地务工的劳动力来说,就可能会出现非自愿型失业。AGE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19,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更大。实践中,很多非农部门在招工时都会有年龄限制,所以年龄越大,找不到工作的可能性也会越大。SKILL的系数显著为负,为-0.539,说明当劳动力拥有一项技术专长时,出现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类似地,EXPER的系数也为负,为-0.096,说明当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时,出现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也会降低。这两个指标都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对务工机会的积极作用。

下面再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情况。URBAN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65,说明对那些最基本的受访样本(即本地工业化对城镇化支撑力度相对较低而家庭又没有被征地的人)来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出现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有所增加。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城镇化通过多种渠道把这部分劳动力释放出来,提高了非农劳动供给意愿,但城镇化自身并没有明显地增加非农务工机会,造成了非自愿型失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通过检验城镇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做进一步的验证。交叉变量IND×URBAN的系数显著为负,为-0.122,说明相对于最基本的受访者,对那些处于工业化对城镇化支撑力度相对较大的乡镇但家庭又没有被征地的劳动力来讲,城镇化使其出现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有所降低。合计起来,城镇化的总影响由正转为负,并降至-0.057,说明对这些样本来说,城镇化会减少非自愿型失业概率。显然,这些乡镇工业化的发展较快,非农就业机会较多,非自愿型失业自然也会减少。另一个交叉变量LOS×URBAN的系数为0.031,说明相对于最基本的受访者,那些处于工业化支撑力度相对较小的乡镇而家庭又被征地的劳动力,城镇化造成非自愿型失业的概率更大,影响要高出0.031,合计起来,达到0.096。可能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征地使其加速脱离农业,非农

劳动供给意愿更明显；但另一方面，城镇化缺乏产业发展的支撑，就业机会较少，非自愿型失业概率更会增多。综合来看，上述结果大致验证了假设 3 的预测。

六、城镇化对非农劳动供给及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

对于上述分析结果，我们已经零星地从供求两个维度进行了尝试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是否成立，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加以验证。

（一）城镇化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对于模型 2 的面板 logit 模型，估算结果表明，Hausman 值为 -0.66，依据类似于前面的分析理由，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见表 3）

表 3 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意愿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Z 值
常数项	-1.893	1.687	-1.122
RAISE	-0.056***	0.011	-5.300
LAND	-0.023**	0.008	-2.793
AGRI	-0.001	0.001	-0.899
WAGE	0.183***	0.040	4.623
WEAL	-0.009***	0.003	-3.558
APPL	0.080	0.063	1.276
CARE	0.027*	0.013	2.090
AGE	-0.144***	0.043	-3.329
MARR	1.038	1.051	0.988
LEAD	0.252	0.329	0.765
EDU	0.064	0.035	1.832
SKILL	0.118***	0.032	3.734
EXPER	0.250	0.231	1.082
URBAN	0.039**	0.014	2.757
IND×URBAN	0.304	0.187	1.628
LOS×URBAN	0.112***	0.028	4.031
对数似然比		-138.33	
Wald 统计量		107.65	
样本数		3558	

表 3 显示，RAISE 的系数显著为负，为 -0.056，说明家庭人口负担系数越大，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会更小。如前所述，随家庭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家务劳动会变得繁重而制约非农劳动供给。LAND 的系数为 -0.023，说明人均耕地面积越大，非农劳动供给意愿越小。WAGE 的系数为 0.183，说明随着工业部门工资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WEAL 的

系数显著为负，为-0.009，说明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非农劳动供给意愿会有所下降，但幅度并不是很大，可见家庭预算约束的松紧程度可能并不是影响劳动供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能大致证明，前文关于农户更偏好收入而不是闲暇或家庭生产的假设是基本贴近现实的。CARE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27，说明社会化服务网络越完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越大。AGE的系数为-0.144，说明年龄越大，非农劳动供给意愿越低，这与经验判断相符。SKILL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118，说明当拥有一项技术专长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会明显增加。

下面再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情况。URBAN的系数为0.039，说明对那些最基本的受访者（处于工业化支撑力度相对较低的乡镇而家庭又没有被征地的人）来说，城镇化使其非农劳动供给意愿明显增加。对他们而言，虽然不存在征地因素的作用，但城镇化进程中其他一些间接因素（如潜在务工地点与家庭距离变近），也会使其非农劳动供给意愿提高。交叉变量IND×URBAN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不管工业化的支撑力度大或小，城镇化都会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增加，二者区别不大。交叉变量LOS×URBAN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112，说明相对于最基本的样本来说，那些处于工业化支撑力度相对较小的乡镇而家庭又被征地的受访者，城镇化对其非农劳动供给意愿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合计起来，总效应达到0.151。

总的来看，上述结果说明，城镇化明显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而不管工业化的支撑力度如何，抑或农户是否被征地，这验证了假说1的预测。当然，对于被征地的农户来说，作用更明显。

（二）城镇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们利用乡镇层面的数据，对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见表4）

表4 城镇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常数项	-1.607 (1.084)	-1.446 (0.993)
LABOR	0.098 (0.076)	0.091 (0.063)
RESOU	11.075*** (3.230)	10.430*** (2.881)
NEAR	—	1.219*** (0.267)
URBAN	-0.806 (1.225)	-0.913 (0.995)
NEAR×URBAN	1.910** (0.707)	2.012*** (0.610)
F (_ui)	65.03	

续表 4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LM		151.87
调整 R ²	0.339	0.343
样本数	144	144
Hausman		20.1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F (χ^2_{ui})、LM 分别为固定截面效应和随机截面效应的检验值。

表 4 显示，F (χ^2_{ui}) 值为 65.03、LM 值为 151.87，它们均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固定截面效应或随机截面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说，因此，不宜采取混合回归方法。最后一行显示，Hausman 值为 20.15，它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说，为确保回归结果的一致性，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看，LABOR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当地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对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明显影响。对照中国当前的现实就可以发现，在产业转移尚未大规模展开的情况下，一些乡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无法与工业资本结合，对当地非农产业发展的潜在作用也无法发挥出来，它们倒经常会通过跨地区迁移支持外地非农产业的发展。RESOU 的系数显著为正，为 11.075，^① 说明矿产资源对乡镇非农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来看核心变量的情况。URBAN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对于基准组的样本（即非城关镇或远离中心城市的乡镇）来说，城镇化并没有明显促进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交叉变量 NEAR×URBAN 的系数显著为正，并达到 1.91，说明与基准组样本相比，比较组（即城关镇或毗邻中心城市的乡镇）的城镇化，对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非农产业的 GDP 占比就能提高 1.91 个百分点。将这两组样本的结果综合起来，大致能验证假设 2 的预测。

七、结论性评语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本文探讨了乡镇层面上的城镇化的就业影响。理论分析和基于河南、湖南等五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都证明，乡镇城镇化的就业效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它并不是静态地满足存量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还会通过各种渠道冲击农村各类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意愿，并改变劳动力蓄水池的容量。可以说，它将使城镇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这种压力将传导到非农产业的发展上。但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乡镇城镇化并不足以保证非农产业的发展，其经济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后果因不同的推进模式而不同。我们发现，在依

^① 2009—2012 年，有些乡镇发现了新的矿产资源，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该变量未被消除。

托周边城市而推进城镇化的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村劳动力的非自愿型失业率也较低；但在远离周边城市的地区，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发展脱节的现象更为明显，非自愿型失业现象也更为普遍。

上述结论提醒人们，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实现城镇规模扩张、人口膨胀的同时，必须寻求产业发展的支撑点，只有真正实现了工业化促进城镇化、城镇化反推工业化，才能妥善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及“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这就需要在整体上设计好城镇化的推进模式，正确处理城镇与城市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问题。

虽然城镇化的人口集聚效应，为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鉴于乡镇产业基础的薄弱性，要发展非农产业，必须借助中心城市、周边城市甚至其他乡镇的外力，利用它们的辐射效应和带动作用，通过产业链的分工、配套和互补等前后向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弥补自身产业发展基础的不足。例如，承接周边城市的产业或加工环节的转移，发展本地的制造业，一些中西部地区城镇甚至可以越过周边城市，与东部地区发达城市直接对接，承接飞地转移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各乡镇企业应结合自身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规划本地的产业项目，避免主导产业的雷同与恶性竞争。在差异化产业格局下，各地之间才能展开互补性的合作。总之，乡镇城镇化的推进，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盲目冒进，要通过嵌入或延伸已有的产业链，整合更多的产业资源，处理好与其他城市及城镇的产业关系，才能为城镇化提供 stronger 的产业动力。也唯有如此，城镇化的发展才不会出现大的失业问题。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ABSTRACTS

(1)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of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China's Public Ownership and Its Developmental Trends

Pei Changhong • 4 •

Taking the operating assets of diversified forms of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s the marginal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their relative dominance,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asset scale and changing share of public and non-public ownership in primary industry and extends the estimation of these factors to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earlier estim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operating assets of China's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were around 487.53 trillion yuan by 2012, of which the assets of the publicly owned economy accounted for 258.39 trillion yuan, or 53 percent.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the value-added and employment share of the non-publicly owned economy accounted for 67.59 percent and 75.20 percent of the total respectively. This indicates that while China's publicly owned assets retain the leading posi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s dominant. Chinese socialism's fundamental economic system is a dynamic one, and thus provid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ownership reform and the policy of adhering to the "two non-vacilla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Chinese socialism.

(2) Employme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er Urban Centers in China

Ding Shouhai • 30 •

Urbanization at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is different from urbanization centered on larger cities. Apart from affecting employment of the labor stock in terms of demand, it acts as a multi-dimensional shock to the labor supply intentions of rural labor and changes the capacity of the labor pool. On the basis of surveys in Henan, Hunan and other three provinces, we find that urbanization at this level generally raises the non-agricultural supply intentions of different forms of labor, but this occurs without an absolute improvement in the demand for labor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leading to variable employment results. In regions relying on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township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re is a marked fall in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In those regions that are cut off from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nearby cities and are promoting

• 204 •

small-scale urbanization on their own,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lags behind and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intensifies. Therefore, we urgently ne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i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t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and this in turn depends on our devising a much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model for promoting urbanization.

(3)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Marx's Transcending Western Centralism

Ye Xianming • 48 •

Based on a scientific critique of Western centralism founded on three dimensions and on his ever more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world history research and critiques of capitalism, from the 1870s on, Marx extend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relations of capitalism from Western Europe to the rest of world while throwing of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centered expressions like “the stagnation of oriental society.” He thoroughly transcended the theory that “Europe was unique” and finally concluded his scientific critique of Western-centric thought forms and discourse systems. On this basis, he pointed out a possi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Russian rural communes and the whole of Russia, placed as they were in the world historical capitalist era, that differed from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model but wa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capitalism. Thus he further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social forms and enriched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of critiques of political economy.

(4)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Mind”: From Ontology to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Chen Shaoming • 68 •

Besides interpreting things or principles through metaphors,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as a complete world outlook, still ha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ings-in-themselves. The key point in understanding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mind” l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ontology to theory of meaning. The precise implication is that separated from the mind's concerns, the meaning of things cannot be confirmed, nor can their value relationship with man be established. Affirming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things and affirming mind as the condition and source of meaning implies that what we call “things in the mind” broadly refers to things in different conscious activities. Things that enter the mind or consciousness and elicit an emotional response, or are even taken into inherent cognition or schema, all represent the manifestation,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bringing things into the mind. Moving from objects outside the mind to objects within the mind involves a general grasp of the conditions which make manifest the meaning of the myriad things.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gs and the mind exhibited in man

• 205 •